

# 曾国藩 「大传」

刘安平 著



无可挑剔的个人修养  
流传百年的治家之道  
至今值得借鉴的政治智慧

米古阅读



中国出版集团  
现代出版社

# 曾国藩

## 「大传」

刘安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大传 / 刘安平著;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1  
ISBN 978-7-5143-5507-9

I. ①曾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曾国藩(1811-1872) —  
传记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9076号

## 曾国藩大传

---

作 者 刘安平  
责任编辑 宋凌燕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  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 
印 张 22.5  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507-9  
定 价 4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# 导 言

微信、微博、智能手机，乃至互联网+，当这些时髦而又很有科技感的新鲜事物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，很少有人会在乎什么历史，更别提花时间去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了。

正是因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，才会下如此判断。其实，物质越是繁荣，越需要有精神寄托，从历史中找寻自己的血脉便是一条又快又实用的途径。

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探寻历史的意愿和能力。从21世纪初开始，中国人对历史的东西就一下子有了兴趣，国学、百家讲坛、“明朝那些事儿”等文化现象的大热，就是最好证明。经过十多年发展，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当被全球化浪潮全面裹挟时，中国人又开始反复问自己那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：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向何处去？

我们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，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人物，读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寻找答案。通过历史人物身处的那个时代，我们可以吸取足够丰富的养料，找到足够多的教训，看到足够斑斓的世界，从而完善我们当下的人生。这难道不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儿吗？

要了解中国历史人物，必定绕不开曾国藩，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

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初名子城，字伯函，号涤生，谥文正，湖南湘乡人。之所以说他特别，原因在于关于他有太多的争议。先说他的

优点，似乎各种能力他都具备了，他好像什么都会，光看后世给他的封号就足以惊人：中国近代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，晚清散文“湘乡派”创立人。除此之外，曾国藩还是距离中国现代社会最近的一个朝代——清朝中的贤臣代表人物，他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晚清四大名臣”。

另外，曾国藩也饱受非议，主要在于他作为军中统帅，南征北战过程中，实在太过残忍，完全看不到他标榜的人性。他最受抨击的黑历史就是在讨伐太平军时，有大肆屠杀的记录，因此他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“曾剃头”或“曾屠户”。

即便有这么多争议，近年来中国社会还是不可逆转地刮起了一股“曾国藩热”，对曾国藩的研究如雨后春笋，街头巷尾谈论曾国藩的人中，既有年过花甲的老人，也有初识文字的孩童。“曾国藩热”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，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会截取曾国藩不同的侧面来了解。

无论怎样，如果回归到中国人本身来看，中国有句老话：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曾国藩的一生基本诠释了这句老话。所以中国近代许多政治人物都对曾国藩有不低的评价，比如毛泽东将其视作“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”。蒋介石则认为他为人之道“足为吾人之师资”，并说“其著作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”。

普通民众看到的曾国藩当然与政治家不同。老百姓心思简单，过小日子，不求平天下，只求独善其身，看看曾国藩，至少能够学些为人处世的哲学。曾国藩学问当然好，他被称为清朝最后一位理学大师，他崇尚程朱理学，把程朱理学运用得从容自如。

老百姓爱读《曾国藩家书》的最大原因是，曾国藩确是近代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传承的典范之人。他身上无不体现了“孝、悌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。“考宝早扫、书蔬鱼猪。即敬奉祖先，周旋亲邻，起早，扫屋，读书，种菜，养鱼，养猪八事。”曾国藩多次在信中告诫兄弟子侄，时

时恪守家风、家德，而这八字也正是他以耕读治家的根本。

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更是彰显了儒家入世处事的要旨，“君臣义”之三纲，他始终没有半点儿逾越，用尽毕生的心血为已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开创了一段暂时稳定、繁荣的局面，被后世称为“中兴名臣”。他荣居高位，却时时谨小慎微，也一再嘱咐弟弟曾国荃戒骄戒躁，总以勤、谦为其根本；他为官三十余年，一身清廉，知人善任，广结有识之士。曾国藩在做官方面的谨小慎微、尽忠职守，乃至开拓进取，都非常契合中国人当下做事做官的思路。

曾国藩身上也有很多为读书人效仿的地方。他一生笃好学问，作文每日不辍，是名副其实的儒家。读书、修身、养性等都讲一个“恒”字，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封家书中，他写道：“予自立课程甚多，惟记茶余偶谈，读史十页，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，誓终身不间断也。”

曾国藩最被人诟病的地方，恐怕就是立德方面。无论怎么辩解，曾国藩还是心狠手辣的军事家，他在家书中即自称“自以杀贼为志，何必以多杀为悔”。曾国藩性格中凶残的一面，或许跟他的成长环境相关。曾国藩生于湖南。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，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世代代耕耘于斯，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。蛮荒之地练就了曾国藩的坚韧个性，当清政府面临太平军威胁时，他才能建立地方团练，组建湘军，并且主要招募家乡一带的农民为士兵。

曾国藩在镇压捻军、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中，不仅亲自杀人，还带着他的父亲与四弟一起杀人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《能静居日记》有详细记载攻破南京城后的情景：“……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。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，匍匐道上。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，老者无不负伤，或十余刀，数十刀……”

曾国藩的争议在他身后一直没有停息。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：“国藩以谨慎胜，宗棠以豪迈胜。”

徐中约在《中国近代史》中如此评价曾：“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、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。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、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”，他随后说道，“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，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，背叛及屠杀了同胞”。

面对这么多争议，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推崇曾国藩？最大的原因在于，谁都知道，世上本来就没有完人。曾国藩身上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，主导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，必然有超越时代、种族、文化的普世性价值。儒学能造就一大批如曾国藩式的伟大人物，表明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力。在全球化越发深入的今天，只有研究、读懂、洞悉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，还原曾国藩真实的内心世界，才能坦然面对中华民族的过往，乐观看待中国今日与未来。

梁启超向来对曾国藩推崇有加，认为“吾谓曾文正集，不可不日三复也”。在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序内，梁启超更是认为曾国藩“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；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”。

因此，这本《曾国藩大传》才有了更多历史和现实意义。

# 目录

- 第一章 家住湘乡山水间…………… 001
- 第二章 考中进士再做官…………… 041
- 第三章 从团练大臣到组织湘军……………089
- 第四章 攻打太平军从武昌下手……………137
- 第五章 天京变乱逆转时局……………181
- 第六章 清政府里的洋务派……………226
- 第七章 走向末路的太平天国……………262
- 第八章 没有太平军的日子……………302



## 第一章 家住湘乡山水间

### 一、以农为业

要想了解本书的主人公曾国藩，必须先从他的家乡说起。

曾国藩的家乡是湖南。从方位上看，湖南处在中国中南部，长江中游，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，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富饶，鱼和大米的产量很大，传统上就喜欢把湖南叫作鱼米之乡。因为这个地方在洞庭湖以南，故得名“湖南”，因为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“湘”。

湖南历史极其悠久。据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，在 8000 多年前，中国人的祖先便在这里繁衍生息，过着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为主的定居生活。西周时期湖南属地为楚国南部。公元前 211 年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设“长沙郡”。唐朝时，第一次设立“湖南观察使”衙署，这也是中国行政区划上第一次出现湖南这个说法。再往后，宋朝设“湖南路”，明朝设“湖广行省”，到了清朝则出现“湖南省”。

湖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富饶的地方，历史上它是一个蛮荒之地。既然荒芜，自然会陆续有人来开发，久而久之，湖南就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形成的发祥地之一。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，但是整个发展繁荣过程相当缓慢，直到唐宋时期，湖南依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，那时候朝廷流放犯罪官员，都喜欢将他们发配到此地，足以说明湖南当时

有多荒凉。

湖南文化上的发展也是一步步来的。蛮荒之地的人以农耕为主，也没有读书传统，这导致湖南人早年间并没有太多高中科举的人。当然，这跟政治中心多在北方有极大关系。转机发生在宋代，那时候文化重心开始南移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沙设立岳麓书院。

岳麓书院的建立，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广泛的文化事件，全国各地的文化人都慕名而来。还有一些知名学者也受到邀请，到岳麓书院讲学。比如福建的张栻、朱熹等，他们都是在这里做研究、带弟子，由此湖湘学派就此开立，一时蔚为大观。永州人周敦颐一直在外做官，他受此影响也回乡讲学，并开理学之先，启发了宋明时代著名学者如朱熹、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等人，他们一起被尊为“理学鼻祖”。

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，湖南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里一下子出现了大批名人，其中尤以政治军事人才居多。中国的《辞海》里就写着，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，湖南籍人士44人，居全国之首。于是出现一种说法，中国近代史有一半是湖南人的历史。

在湖南所有地方中，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又是极其出人才的地方。有一种略微夸张的说法是：湖南近代史有一半和湘乡县有关。这么说也有它的根据，如果以晚清、民国时期的湘乡县城为圆心，画一个半径为200里的圆圈，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包括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谭嗣同、黄兴、蔡锷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等，他们的家乡都在这个圆圈内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，当然是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。其中，晚清经世致用的学风是重要原因。清朝在入关之初，为了拉拢民心，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拉拢的手法。随着政权逐步稳定，清朝统治者的傲慢越来越大，排斥汉族之意便慢慢显现。汉族知识分子因文字狱被杀者，不计其数。为了自求多福，知识分子只能钻入故纸堆里，做一些与

政治毫无瓜葛的考据，这也是清代考据学比较发达的关键原因。

不过，在所谓蛮荒之地的湖南，考据学却几乎未在此地发挥影响。湖湘学子对考据不感兴趣，周敦颐、朱熹等人在湖南埋下的理学种子，在此刻发芽成长。这种理学植入了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和王夫之的“忧国忧民”，从而在湖南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风潮。

至于为什么是在湘乡出现这么多名人？这背后还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。湘乡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，秦朝属长沙郡湘南县。西汉高祖五年（前 202）置长沙郡。后于哀帝建平四年（前 3），封长沙王的儿子刘昌为湘乡侯。自此才有了湘乡这个名字。东汉时改长沙郡，原湘乡侯领地改为湘乡县。及至清代，湘乡县隶属于长沙府。

说到这里，需要交代一下清代的行政配置。清乾隆帝将全国设 18 个行省，分别由 8 位总督和 15 位巡抚管辖。8 位总督辖区是：直隶；两江，包括江苏、江西与安徽；两广，广东与广西；湖广，湖北与湖南；四川；闽浙，即福建与浙江；陕甘，包括陕西与甘肃；云贵，即云南省与贵州省。

总督的权力极大，可以说是属地最高行政长官。总督自动拥有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副都御使职衔。总督不仅对该省的最高文官拥有领导权，他还对军队具有特殊的权力。在鸦片战争之前，总督有时会被钦差大臣压过一头。钦差大臣的地位就更加特殊了，他经常是临时指派，虽然在省里没有行政权，但因为是代表皇帝查办一些特殊事项，隐形的权力显然更高。不过，在太平天国期间，总督常常兼任钦差大臣，以此来加强总督的权势。

总督的下一级官员是巡抚。巡抚与总督一样，在地方治理上也手握生杀大权，比如他要过问当地政事，审核刑事案件等。除此之外，监督下级行为也是巡抚的职责。总体来看，清朝的行政规划使得每个省都是一个完整的领地，总督如同藩王一样极具权势。

从实际情况看，每个省完全不依赖其他省份而存在，每个省都有自己的陆军、水师、征税系统及其社会习俗。这导致了省与省之间的方言、生活习惯、文化习俗都不一样。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独立，百姓也坚持自我的文化属性，以此来区别外省人士。只有在涉及盐的贸易和水师的时候，省与省之间的领导者，才会在朝廷某种程度的控制下做出让步。在其他几乎所有的事务中，督抚之间都会彼此推诿。

不过，即使官员们拥有如此大的独立性，他们仍然受到制约：一方面，来自朝廷的官员在各省悄悄监视着高级官吏，主要目的是检查他们的为官履职情况，并时刻注意这些地方大员是否存在谋反的迹象，这也是朝廷最为担心的隐患。与上级的担心一样，这些地方高级官吏同样派人到县城里监视低级官吏。

另一方面，地方官员还要受到另一个不可忽视群体——士绅阶层的制约。士绅的一个突出作用是，他们在乡村地区各种民间组织的协助下，防止官吏们侵犯民众约定俗成的权利。士绅阶层往往有家族传承，因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以及与官方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制衡的矛盾连接，士绅能够在当地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

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，曾国藩在湖南湘乡出生、成长。曾国藩打从记事起，就知道他的家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，早在蜀汉时期，湘乡就曾出现蒋琬这样的名相，清前期和中期更是出现了谢振定、邓文洋、罗国俊等名臣。不过，曾国藩自己绝不会料到的是，真正让湘乡闻名世界，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他自己。特别是他后来一手创立的湘军“剿灭”太平天国这一巨大功勋，不仅避免晚清政府过早倒台，更让他自己声名鹊起。

说到曾家，其实也非常有历史典故。曾氏家族是中国的六大家族之一，其源头是中国的大哲学家曾子，他是孔夫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。从曾国藩家族历史看，并没有迹象显示会出大人物。曾国藩的祖籍在衡阳，

世代务农，没有显达之人。到了曾竟希（曾国藩的曾祖父）的祖父曾元吉时，突然发达起来。曾家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，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，整个家族开始向兴旺的方向发展。等到曾元吉年岁渐老时，他自知余年不多，便提前安排后事，将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等全部家业分给了子孙，仅留下衡阳四十亩地用于养老送终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，曾元吉病故。他的子孙靠分得的家产，平日里依靠收租就能有不错的收入，生活依然衣食无忧。曾元吉有六个儿子，其中次子叫曾辅臣。曾辅臣虽然也分得一份家产，但不改勤劳作之风，每日坚持耕作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55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。

曾竟希继承了父亲的俭朴作风。但他内心里有一个暗暗的念头在浮动：搬家。之前提到，曾家在大界有几处宅院。大界位于湘乡县城西南100多公里之外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。大界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子。曾竟希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风水，于是决定举家搬到这里。清嘉庆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808年，白杨坪新迁来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姓曾，全家十几口人，长者就是曾竟希，那年他已66岁。

从各种历史史料中，至今无法判断曾竟希举家迁往白杨坪的具体原因。按照中国传统农人的生活习俗，除非曾竟希一家在居住地发生重大变故，否则不会有此重大迁徙。中国人传统上也不是一个喜欢频繁移居的民族，对频繁迁移居住地并不热衷，反而喜欢守着故土世代耕耘。如此看来，曾家的这一迁移十分不同寻常。

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白杨坪成为曾竟希一家新的安身立命之地。白杨坪也成为绵延五世、曾国藩外出做官后一直心系的老家。曾国藩曾经多次在文章里怀念家乡：我家湘上高嵎山，茅屋修竹一万竿。最是故园难忘处，待莺亭畔路三叉。莽莽寒山匝四围，眼穿望不到庭闱。絮漂江浦无人管，草绿湖南有梦归。

在白杨坪居住的前几年，曾家生活一如往常。转机发生在第四年冬天。这天晚上，曾竟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：他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，先在宅堂里盘旋良久，随后又跃入内庭环绕一周。这条巨蟒究竟意欲何为？他正在梦里思索，忽然一下子被吵醒。原来是家人报喜，他的孙媳妇刚刚生了一个男孩儿。曾竟希还没看到孩子，但回想起之前的梦境，坚持认为：此梦为吉兆，新生的男孩儿必定能光耀门楣。

这个伴随着美梦与吉兆出生的婴儿就是曾国藩，他出生的日期是1811年11月26日。曾国藩的出生，不仅改变了曾家整个家族的命运，更改写了清朝的历史。

## 二、祖父曾玉屏

曾国藩的出生，成了曾氏全家寄托希望的所在，其中最高兴的长辈莫过于曾国藩的祖父。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曾家是绝对的大家长，他不光地位最高，他自己的个人品格也极其让人佩服，周围邻里十分尊敬他。在他身上，完美地呈现了中国传统“耕读”持家的学风。

曾星冈，名玉屏，他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清太学生。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，曾玉屏的子女并不多，他只生了三个儿子，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，次子早卒，三子骥云未曾生育。旧式大家族里，父亲的权威向来不容挑战，在曾家这种传统儒家家庭里，更是如此。曾玉屏不仅对自己的儿子有极其严格的教育，对待孙辈的曾国藩也是一样严苛。幼年的教育对人的一生都会有影响，因为祖父的教诲，让曾国藩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，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，身上都有可以印证“隔代遗传”的“基因密码”。

说起来，曾玉屏也不是一下子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贤达之人。他年轻时可以称得上顽劣，因家境尚算富裕，他早年沾染了“游惰”习气，不光有书不读，更沉湎于嬉戏游玩，常常骑着马到当时比较繁华的湘潭

市肆，与一些“裘马少年相逐，或日高酣寝”。

湘潭自古就是湘中著名的大都会。自从南宋以来，湘潭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，其热闹程度自是一般粗野乡下所不能比的。湘潭地处湘江中游，四季通航，南来北往十分便利。明代时，诗人周圣权就在《题万楼》中赞颂湘潭美景：岸花明媚接芳洲，三月江风送客愁。台阁初成延胜迹，山川有待识名流。野烟窈窕村中树，帆影参差槛外舟。清绝潇湘春唱和，竞将韵事一齐收。清朝人张九铤在《昭山》中也曾写道：西风一片写清秋，两桨飞随贴水鸥。摇到湘头望湘尾，昭山断处白云浮。

从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篇中，湘潭的秀美山川已经让人浮想联翩。亲身畅游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曾国藩的故乡湘乡，距离湘潭只有不足百里路程，如果跃马扬鞭，一两个时辰便可到达。

少年时代的曾玉屏对未知的世界十分好奇，虽然懵懂，但放荡不羁的性格让他无所顾忌。整日里晚睡早起，巡游湘潭，引得邻里乡亲时常讥笑和斥责。曾玉屏当时年纪尚小，无论是周围邻里的嘲笑，还是家里长辈的训斥，他都毫不在乎，玩乐习气一直不改。

直到年岁渐长时，曾玉屏开始察觉自己的行为失当。清朝晚期仍属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，那时一个人的名声显得格外紧要。曾玉屏经历的事情多了，也开始慢慢在意自己在外人眼里的印象。从他内心深处，也的确不希望曾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手中。最后一次，当曾玉屏听到他人讥笑他：“言行浮薄”，“将覆其家者”，内心受到极大刺激，自尊心似乎在瞬间崩塌。他开始反躬自责，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年少无知。他把整日驮着他游玩的马卖掉，徒步走回家中。

自此以后，曾玉屏仿佛换了一个人。每天天未亮之时，他便起床到农田做活儿。他的家乡湘乡地处丘陵地带，全县一半以上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，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自然少不了辛苦。曾玉屏不怕这些，突然间有了些“愚公”的精神，一步一步地开始了在山丘造梯田的尝试。

曾玉屏当年的努力，曾国藩后来曾经做过详细回忆，大意为：35岁那年，曾玉屏在高嵎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，整日住在那里。小茅屋周围的梯田坡陡高峻，而且田块的面积很小，简直如同瓦片大小。

曾玉屏并不觉得这里有多苦，他心里只想着劳作这一件事。他开山凿石，拓荒耕地，硬是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，景象蔚为壮观。夜晚来临，曾玉屏也不会感觉到孤独，他有很多事情做。比如他会亲自放水，听虫鸣鸟叫以知晓节气。艰苦劳作中，他又把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，作为乐趣。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，每天早晨亲自除草，或者在晚上叫佣工帮忙施肥。除此之外，曾玉屏还在屋里喂着猪，屋外又养着鱼，他把自己全部的生活打理得忙碌且充实。

正是在这寻常耕耘及收获中，曾玉屏的人生开始经历一个新的阶段，这和他过去整日寻欢作乐的日子是不同的。他第一次发现，原来靠劳动也能获得如此多的喜悦，人生的满足感也因此得到。后来，他也时常跟家人说起在这期间悟出的人生哲理：只要是自己亲手耕种并且收获的粮食和蔬菜，吃起来味道一定非常鲜美；只要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东西，享用起来也会非常心安理得。

付出自然有回报，这回报不只让曾玉屏内心变得十分丰富，更让他在世俗社会里得到乡人的交口称赞。特别是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相连的田地时，周围的邻里乡亲意识到，原来那个纵情声色、不务正业的少年人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曾玉屏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积极，看待周围人和事物的眼光也跟过去完全不同。

生活渐渐走上正轨之后，曾玉屏依靠他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，使得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慢慢改善，这为他子孙后代的耕读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曾氏几代人以务农为生，包括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，曾家社会地位直线跃升。直到曾玉屏发迹，曾氏家运开始发生转机，在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《大界墓表》中，



有清晰的文字描述了曾家在地方的社会地位。

曾家的社会地位完全仰仗曾玉屏的努力获得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推动力，便是曾玉屏主导下的筑宗祠、置祀产举动，让他一跃成为曾氏宗族组织中名副其实的领袖。

整个事情的起因如此：本来曾氏宗族没有祠堂，曾氏家族也如一盘散沙一般。前文提到，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曾元吉去世后，他的四十亩田被六房长孙均分，长孙把这些田地用以收租。后来，这四十亩地又改为曾家的祀产。嘉庆年间，作为曾元吉的曾孙，曾玉屏积极主张和活动，让曾氏族长把所有族人召集起来，共同决定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，并且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。到了第二年，曾氏宗族又聚在一起商定，将曾元吉留下的青定塘湾的四十亩田也作为祭祀的公产使用。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，共五十亩公产，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。

在这次祀产确定事件中，虽然召集者是曾氏家族中的耆老、长辈，但起积极推动乃至决定作用的，却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。从历史记载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曾玉屏所说“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”，“后世虽贫，礼不可墮，子孙虽愚，家祭不可简也”。种种历史记载已经表明，曾玉屏在家族中的言辞已非常自信且有分量，说明他在宗族中的事实领袖地位已经确立。

曾玉屏确立其宗族领袖地位的另一凭借是其经济实力。伴随他在农田耕种上的成功，曾玉屏的个人财富也已积累到新的高度，曾玉屏成为远近闻名的、不但有经济实力而且又有威望的人物。在湘乡县，修桥补路、恤孤济贫这样的公益活动，都少不了曾玉屏的身影。

当有了钱、家族地位得到提升之后，曾玉屏开始考虑整个家族的发展大计。他自己非常清楚，早年就是因为读书不多，才让他耽误了许多光阴。曾玉屏也一直以没有拿个功名作为憾事，因此，当曾家的经济实